

古與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藝文

第十五輯 第十五冊

「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

張金環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五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5 冊

「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

張金環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張金環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64 頁；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五輯；第 15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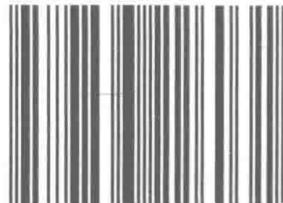
ISBN 978-986-322-603-1 (精裝)

1. (清) 吳偉業 2. 敘事詩 3. 詩評

820.91

103001203

ISBN-978-986-322-603-1



9 789863 226031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五輯 第十五冊

ISBN : 978-986-322-603-1

「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

作 者 張金環

主 編 巍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第十五輯 20 冊 (精裝) 新台幣 3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

張金環 著

作者簡介

張金環，1977年生，籍貫山東。2006年於首都師範大學獲文學學位，現任教於中國石油大學人文學院。在《齊魯學刊》、《山東師範大學學報》、《藝術百家》、《名作欣賞》等刊物發表《相似人格的不同哲學內涵——李贄與李夢陽文學思想對立的根源》、《明清之際「詩史」觀的新進展——吳偉業知人論世觀內涵新探》、《吳偉業戲曲創作的「詩史」化傾向》、《明清之際詩歌創作的自飾傾向及成因——以吳偉業為個例》等學術論文。

提 要

本書以文學思想史的學術理念為指導，從吳偉業與吳中文人文學傳統、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吳偉業的人格心態、「梅村體」之核心思想——吳偉業的「詩史」觀念、「梅村體」之創作實踐——吳偉業「詩史」觀之體現、「梅村體」所涉及的文學思想內涵、「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七個核心問題展開，以人格心態研究為中介，將文學思想內部要素與外部歷史文化諸要素相結合、創作實踐與理論批評相結合，逐步分析「梅村體」的成因與動態發展全過程，進而剖析其在明清之際文學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對中國古代「詩史」觀的貢獻。本書的基本觀點是：以吳偉業「詩史」觀為核心思想的「梅村體」，主要是在吳中傳統、明清之際社會思潮與吳偉業人格心態的綜合作用下發生、發展、演變的。吳偉業不是停留在傳統「詩史」觀主要強調客觀紀實的思想層面上，而是從明亡前的以詩存史，發展到明亡後的情、史並重，再到仕清後的以「心」傳「史」，逐步突破傳統「詩史」觀的紀實思想，形成了合乎詩歌抒情特質的「心史」觀念。與吳偉業「詩史」觀的發展演變一致，「梅村體」創作由客觀敍事、發展到敍事與抒情相結合、再到抒情以寫「心」，逐步打破傳統「詩史」以敍事為主、脫離詩歌抒情本質的藩籬，並在明清之際複雜的時代境遇與個人不幸遭際的激發下，發展了多層次的表現功能，體現了明清之際「詩史」觀的最新進展。



目 次

緒論	1
一、研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
二、主要創新點	8
三、「梅村體」辨析	10
第一章 「梅村體」成因之一：吳中傳統與明清之際社會思潮	23
第一節 吳偉業與重個體、尚文雅的吳中傳統	23
一、從玉山草堂詩人到「太倉十子」	24
二、家族傳統	35
第二節 吳偉業與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	46
一、吳中經世思潮的興起	46
二、吳偉業與復社的實學思想	56
三、吳偉業與復社的經世致用文學思潮	65
第二章 「梅村體」成因之二：吳偉業的人格心態	71
第一節 明亡之前：徘徊於「仕」與「隱」之間	71
第二節 易代至仕清之前：複雜微妙的遺民心態	80
第三節 仕清之後：懺悔與贖救相交織的複雜心態	90
第三章 吳偉業「詩史」觀：「梅村體」之核心思想	107
第一節 吳偉業「詩史」觀的內涵	107
一、詩史的基本性質：記事要「真」、論事要「當」	108
二、詩史的基本功能：反映「世運升降、時政得失」	115
三、詩史的深層內涵：「史外傳心之史」	120
第二節 吳偉業「詩史」觀的發展演變：從存「史」到「傳心」	122
一、自覺以「詩」存「史」的早期詩史觀	122
二、記史與傳情並重的創作傾向	126
三、以「心」傳「史」的晚年「心史」觀	134

第四章 吳偉業「詩史」觀之體現：「梅村體」之創作實踐	141
第一節 「梅村體」創作風貌的發展演變	141
一、明亡前：客觀記事	142
二、明亡至仕清間：敘事與抒情相結合	144
三、仕清後：情餘於事	169
第二節 「詩史」觀向詞的延伸	178
一、由「詩史」觀延伸而來的「詞史」觀	179
二、比「詩史」更能「縱發欲言」的「詞史」創作	181
三、梅村「詞史」的傳播與接受	185
第三節 「詩史」觀向戲曲的滲透	191
第五章 「梅村體」所涉及的文學思想內涵	203
第一節 經世與不朽並重的文學目的論	203
第二節 作者與時世並重的文學創作論	209
第三節 「知人論世」文學批評觀的新內涵	223
第六章 「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	235
第一節 明清之際「詩史」觀的重新盛行	235
第二節 「心史」觀：明清之際「詩史」觀的新進展	239
一、《心史》出并引發的思考	239
二、「心史」觀之典型體現：明清之際詩歌創作的自飾傾向	247
參考文獻	255

緒論

「詩史」思想是明清之際經世致用文學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吳偉業在「詩史」觀支配下創作的「梅村體」，不僅是明清之際「詩史」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古代「詩史」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它在明代詩學批判、反思傳統「詩史」的基礎上，既保留了傳統「詩史」反映史實的內核，又突破了傳統「詩史」脫離詩歌抒情本質的局限，體現了明清之際「詩史」觀的新進展。本書即以「梅村體」及吳偉業「詩史」觀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明清之際「詩史」觀對中國古代「詩史」思想的獨特貢獻。

一、研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梅村詩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1949 年以前，某些文學史著作雖有所涉及，如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劉經庵《中國純文學史綱》、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凌獨見《新著國語文學史》、李維《詩史》、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等，但基本上沿用清代論者的觀點，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論，並未作進一步的理論探討。相對來說，梁乙真《中國文學史話》對吳詩「哀感頑豔」的美學風格及其仕清後的「枉節自恨」之作分析較為深

刻。^[註 1] 1949 以後，論者則往往從階級觀念出發，因吳偉業的氣節問題而否定其詩歌成就。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吳偉業雖然對清征服者也無好感，但他更反對農民起義，思想「基本上屬於封建儒家體系」。雖然不願出仕，但態度是「乞求」而非反抗，所以是一個「骨頭不硬，缺乏反抗性的人」。^[註 2] 又如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也強調「誣譖農民軍」、「不直接揭露民族叛徒」是吳詩的缺點。^[註 3] 在這段長達 30 年的時期裏，關於吳偉業的研究論文共 6 篇：《吳梅村佚詩八首》、《吳梅村逸詩》、《談遷與吳梅村》、《吳梅村絕筆詞質疑》、《略談吳梅村的七言古詩及其〈蕭史青門曲〉》、《吳偉業〈圓圓曲〉與〈楚兩生行〉的作期》，^[註 4] 都是材料輯佚與考證的工作。

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吳偉業詩歌才又重新受到學界的關注：

一、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吳詩研究，在確認其「詩史」特質的前提下，以索隱批評為主導，側重「詩史互證」。研究主要圍繞兩個主題進行：第一，《圓圓曲》是否為紀實之作；第二，吳偉業仕清的原因，並由此展開了一場論爭，規模雖不大，卻一直持續到 80 年代末。

這場論爭首先是由姚雪垠《論〈圓圓曲〉》一文發端，^[註 5] 隨後一系列文章參與了論辯，如萬揆一《對〈論〈圓圓曲〉的一點質疑〉》、^[註 6] 童思翼《〈圓圓曲〉辯》、^[註 7] 王孟白《吳梅村及其詩歌評價問題（兼與姚雪垠、黃裳同志商榷）》等，^[註 8] 論爭雖然並

[註 1] 梁乙真《中國文學史話》，上海元新書局 1934 年印行，第 732 頁。

[註 2]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下，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年版。

[註 3] 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21 頁。

[註 4] 據中山大學中文系所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索引》。

[註 5] 《文學遺產》1980 年第 1 期。

[註 6] 《書林》1980 年第 6 期。

[註 7] 《文學遺產》1981 年第 2 期。

[註 8] 《北方論叢》1982 年第 1 期。

未觸及文學創作、文學思想本身，但客觀上卻觸發了對文學本身的關注：什麼是「詩史」？詩歌與歷史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到了 80 年代中期，研究進一步深化，主要表現是劉世南與王興康相互辯駁的三篇文章：劉世南《吳偉業論》認為「吳詩雖號『詩史』，其實是名不副實的」，理由有三：(1) 吳詩無「諷諭實質」；(2) 吳偉業對現實的認識膚淺，對農民起義極端仇視，其詩「只不過是地主階級的輓歌」；(3) 吳偉業在詩中頌揚清朝。^{〔註 9〕} 而王興康《關於吳偉業及其詩的評價問題：與劉世南同志商榷》則針對「詩史」概念提出了不同觀點，認為應該按「古人」理解的「詩史」來衡量吳詩，「只要能在詩中較真實地反映一朝一代的歷史事件（主要是政治事件），反映這些歷史事件在人民中引起的反應，就可以稱之為『詩史』，而沒有必要同時要求能夠有『諷諭』的作用，有深刻的認識，有反封建的內容。」^{〔註 10〕} 劉世南《再論吳偉業及其詩：答王興康同志》再申前說，並提出「馬列主義的批判精神」作為衡量「詩史」的標準。^{〔註 11〕} 二人爭論的實質是如何處理文學真實與歷史真實的關係。顯然以「馬列主義的批判精神」來苛求古代文人是一種不尊重歷史的表現，以此衡量古代文學作品的優劣也是違反文學自身發展規律的做法。直到 80 年代後期，徐仲偉《〈圓圓曲〉真實辯》一文，才針對這一文學理論問題對《圓圓曲》是否為「詩史」的論爭做了比較客觀的總結：「如以史家的眼光，按『信史』的要求，去考察『衝冠一怒為紅顏』的話，那它是不合格的，它不是『不空』而是『空』得很厲害，如果把它坐實理解，就未免把複雜的歷史現象簡單化了。」而「藝術的目的不在對生活作客觀地摹寫，而在能動地主觀表現，它所追求的是一種超越了對象本身的生活真實而達到的意念的真實。」所以《圓圓曲》作為文學作品而非歷史著述是「運

〔註 9〕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85 年第 3 期。

〔註 10〕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第 2 期。

〔註 11〕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第 2 期。

用典型化的方法，把吳三桂降清諸因素中陳圓圓的作用提取出來，加以突出，放大」從而「使得對吳三桂的諷刺更沉痛、更有力。」所以「《圓圓曲》的真實性是一種文學的真實性，把它視為向壁之作固然不妥，但目為『信史』又未免太過。它是一首以一定史實為依據，經過作者創造性的提煉加工，具有濃重抒情色彩的敘事詩」。^(註 12) 從現代文學理論的高度肯定了吳偉業「詩史」的文學價值。

總之，80 年代的論爭，基本上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反映了當時人對「詩史」的認識，尚未涉及吳偉業本人的「詩史」觀。除了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的討論外，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尚為數不多。其中黃天驥《論吳梅村的詩風與人品》一文可以說是較有深度的力作，比較深入地分析了社會處境、人格心態與詩歌風格的關係。

二、90 年代以後，總體上已從 80 年代對文學外部因素的研究，轉向了對文學本身的關注。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對詩歌內容與形式諸方面的特徵展開了廣泛的討論，但大都側重文本分析，對詩歌背後詩學觀念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專著：1990 年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1994 年裴世俊《吳梅村詩歌創作探析》，1998 年伍福美《吳梅村詩歌藝術新論》，1999 年葉君遠《吳偉業評傳》，2000 年 Tung Yuan-fang《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ien-hsiang and Wu Mei-ts'un》、王建生《增訂本吳梅村研究》，2001 年徐江《吳梅村研究》、施祖毓《吳梅村歌詩編年箋釋》，2003 年施祖毓《吳梅村鈎沉》；還有博士論文（未出版）：1995 年程相占《吳偉業與中國古代敘事詩》、1999 年何銳鈺《吳偉業詩歌研究》、2002 年孫利平《吳偉業戲曲研究》。其中馮、葉《年譜》為此時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材料基礎。總體上側重對作品橫向、靜止的剖析，而未揭示其文學思想的動態發展過程。

(註 12) 《山東大學學報》1988 年第 4 期。

這一時期研究論文的數量也頗為可觀，與專著一樣，大都聚焦於文本本身。首先，詩歌的藝術特徵是最受關注的，出現了一系列優秀論文：如曾思藝《以詞法寫敘事詩》〔註 13〕、向琪《吳梅村敘事詩的傳奇色彩》〔註 14〕試圖打通詩、詞、曲的界限，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從文學的本質來說，不同體裁的作品間的確存在某種共通性，尤其是同一個作家在同一時期所作的不同體裁的作品。《論吳梅村的早期詩歌》批駁了清人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朱庭珍《筱園詩話》等早期吳詩為「豔體」的觀點，認為早期的梅村詩已具備了「激楚蒼涼」的特徵。〔註 15〕而王于飛《吳偉業早期豔體詩略論》則對此提出質疑，結合同時期的詞作，重申早期詩為「豔體」之說（但不同意《四庫總目》關於吳詩「入手處」為豔才的觀點，認為吳偉業開始作詩時受萊陽宋九青之影響，不乏遒勁。退隱家居以後才沾染時習，多為豔體）。〔註 16〕另外如蔣煒《談吳梅村後期詩歌》〔註 17〕，郭建球《論吳梅村敘事詩》〔註 18〕，裴世俊《簡論吳梅村詩歌的悲劇特色》〔註 19〕，李世英《吳梅村敘事詩的審美特徵》，李秀成《吳梅村的詩歌藝術》，葉君遠《論吳梅村詩歌的藝術特色》等都是對吳詩藝術特徵的研究。其次，開始從人格心態入手分析詩歌創作的成因。如徐江《吳梅村八年遺民時期的詩歌創作與政治心態》〔註 20〕、沈金浩《懊喪心態籠罩下的「意識流」：吳偉業〈過淮陰有感〉解析》〔註 21〕、劉彥君《失節之痛——吳偉業傳奇論》〔註 22〕、王于飛《從〈臨春閣〉到〈秣陵春〉——吳梅村劇作與清初士人心

〔註 13〕《湖北民族學院學報》1994 年第 3 期。

〔註 14〕《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0 年第 1 期。

〔註 15〕《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 年第 1 期。

〔註 16〕《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3 年第 2 期。

〔註 17〕《吳中學刊》1991 年第 3 期。

〔註 18〕《中國文學研究》1997 年第 1 期。

〔註 19〕《山東師範大學學報》1996 年第 5 期。

〔註 20〕《河南大學學報》1999 年第 4 期。

〔註 21〕《文史知識》1995 年第 12 期。

〔註 22〕《中國文化報》1999 年 12 期。

態的變遷》〔註 23〕等文章都注意到了作者心態對創作的直接影響。

此時期的專門史著作，也明顯反映了上述特點。如朱則傑《清詩史》分析了「梅村體」在內容與形式上對元、白歌行的繼承與發展；值得一提的是，他指出了吳偉業自覺的「詩史」創作動機：「吳偉業創作『詩史』，……有著明確的指導思想，也就是有意以詩為史，以此作為追求的目標」。〔註 24〕雖然早在清代，趙翼、朱庭珍等人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但現代研究者卻往往忽略。又如嚴迪昌《清詩史》則從人格心態入手分析，認為吳之仕清是由於「名心未除」；認為「深情麗藻，是構成『梅村體詩史』特色的關鍵因素」；並且敏銳地指出吳梅村創作動機中對「身後名」的考慮：「詩人是聰明的，他生前先自責『失身』，而『萬古慚愧』，必為『後世儒者所笑』，後世之人也就真能寬宥、同情他。」所以「姑勿論其詩，即以其人心態的層疊複雜看，以他對詩的深具生命價值的認識而言，已是詩史所罕見。吳梅村的存在，意味著作為言志抒情的詩這一文體，進入了載負能量更見深廣，其承託的『心聲』也將愈見轉曲襲積」。〔註 25〕但由於不是專門的吳偉業研究，故未由此進一步探討這種動機、心態與詩學思想的關係。

此時期對吳偉業詩學思想的研究仍然比較薄弱，專題研究為數不多。林啓柱《試論吳偉業的文學思想及其淵源》強調吳偉業對明七子派復古思想的繼承，認為「吳偉業的復古文學思想，更直接以明七子為其淵源，而且對七子以復古為革新的現實主義精神有所發揚。」「儘管吳偉業對明七子理論有所突破和發展，但他的詩學主張基本上是倒向七子一邊的，在明季詩文領域復古與反復古的鬥爭中鮮明地站在復古立場上極力為七子辯護」。〔註 26〕徐江《吳梅村詩學理論芻論》則拈出其文學理論中的主要觀點，進一步解釋說明，進

〔註 23〕《浙江學刊》2001 年第 2 期。

〔註 24〕朱則傑《清詩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9～65 頁。

〔註 25〕嚴迪昌《清詩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5～402 頁。

〔註 26〕《重慶師範學院學報》1996 年第 3 期。

而得出結論：「梅村詩學的中心論點是『取其中』和『不可一端而求』」，認為梅村詩詞「轉益多師，兼宗唐宋」。^{〔註27〕}重在理論的勾勒，缺乏與創作實踐的結合。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關注的也是其理論表述。^{〔註28〕}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關於吳偉業詩歌的研究，以文本本身研究為主，多從平面展開探討其方方面面的特徵，對處於動態發展中的詩學思想的研究則相對較為薄弱，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多數研究聚焦於其詩歌的「詩史」價值及自成體派的藝術成就，而忽視對其思想成因的揭示，缺乏對吳偉業本人及明清之際「詩史」觀念的探討，因此對梅村「詩史」的認識也存在偏差，大都將吳偉業晚年以「心」傳「史」的詩歌排除在「詩史」之外。這是不符合吳偉業本人及明清之際詩學思想實際的。「心史」觀在明清之際已頗為盛行，吳偉業本人就有「史外傳心之史」的理論命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學界對「梅村體」的理解也存在諸多紛歧與矛盾。詩歌本身呈現出來的特徵總是多樣性的，以外在特徵為標準界定「梅村體」難免顧此失彼。

第二，涉及吳偉業詩學淵源的研究，仍然沿用清代以來的觀點，強調其繼承前後七子「宗唐」思想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他眾多因素。整個明代，文學流派紛爭，心學思潮引導下的文學解放思潮對復古思想形成了強烈衝擊；吳中文學張揚個性、熱衷結社的傳統，隨著吳中地域經濟、文人社會地位與思想的改變，以更加複雜的形式被保留……它們在與復古文學思想競相紛爭的過程中，日益暴露出「復古」的弊端。所以，處在明末清初的吳中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與特殊地域的吳偉業，詩學思想成因是非常複雜的。

第三，涉及吳偉業心態與創作關係的研究，大都強調「文如其

〔註27〕 《中國文化研究》2002夏之卷

〔註28〕 王運熙《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144頁。

人」的一面，而忽略了「文不如其人」的一面。由於受傳統「文如其人」思想的影響，未能深入、準確地把握其真實的人格心態，因此對「梅村體」創作動機的理解仍存在偏差。

第四，關於吳偉業詩學思想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主要是對其理論主張條分縷析，缺乏與創作實踐的結合，也缺少對思想發展演變的關注。

針對目前學界研究的現狀，筆者將在本書中盡力解決這些問題。

二、主要創新點

本書以文學思想史的學術理念為指導，將吳偉業放在明清文學思潮發展演變的進程中和吳中這一特定的地域傳統中，又將其放在明清之際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中來考察。通過人格心態研究這一中介，將文學思想內部要素與外部歷史文化諸要素相結合、將創作實踐與理論批評相結合，探討「梅村體」及其核心思想——吳偉業「詩史」觀的成因與動態發展過程，進而剖析其在明清之際文學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對中國古代詩學的貢獻。

主要創新點如下：

一、吳偉業與吳中傳統的承傳關係。吳偉業所感受繼承的吳中文學與文人傳統，是形成「梅村體」華豔婉麗之特徵與其情、史並重之「詩史」觀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學界尚無論述。吳偉業不僅家世與吳中文化傳統密切相關，而且自身也具有強烈的地域意識，以繼承吳中文學與文人傳統自任。本書除在第一章集中論述外，其餘一些章節也會涉及到吳偉業所受吳中傳統影響的一些側面。

二、吳偉業與明清之際的社會思潮。吳偉業「梅村體」及其「詩史」觀受到了東林學派與復社實學思想的影響，學界業已指出。但他具體接受了哪些方面的思想，通過什麼渠道接受此種影響，卻論述不詳。本書主要通過吳偉業的交遊，把這一大思想背景落實。

三、吳偉業的人格心態研究。人格心態是各種外部因素影響文學

思想的中介，也是理論認識與創作實踐的中介，直接決定著作者的創作心態。吳偉業人格心態的層疊複雜，在中國古代文人中是非常罕見的。對此，現有研究在論述其文學創作時已有所涉及，但大多只注意到「文如其人」的一面，而對其具體發展過程與演變原因尚無專門論述。本書系統全面地論述其發展演變的軌迹，並著重探討其掩藏在文學背後、「文不如其人」的一面，進而剖析明清之際文人在生命與名節間飽受煎熬的心態及其對詩歌創作的影響。

四、吳偉業「詩史」觀的具體內涵與發展過程及演變原因。目前，對吳偉業「詩史」觀的豐富內涵尚缺乏深入探討，對其發展過程與演變原因也無系統論述。本書將吳偉業的理論表述與創作實踐相結合，並結合明清之際其他文人對「詩史」的理解，探討吳偉業「詩史」觀的具體內涵與發展過程及演變原因，從而揭示他對傳統「詩史」思想的豐富與補充以及對明代詩學「詩史」觀的揚棄。

五、吳偉業「詩史」觀在「梅村體」創作中的體現。學界對「梅村體」藝術特徵的研究已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由於對其核心思想——吳偉業「詩史」觀的理解不夠全面，所以對「梅村體」的理解仍存在偏差，以致把長篇歌行以外的所有作品都排除在了「梅村體」詩史之外。本書則在重新界定「梅村體」的基礎上，深入探討這些特徵何以會形成，認為是其「詩史」觀在創作實踐中的體現，並探討其「詩史」觀在其他文體創作中的滲透。

六、「梅村體」所涉及的文學思想內涵。關於吳偉業的文學思想，現有成果注重的是對其理論表述的探討，諸如文學在吳偉業人生中的作用，應如何創作？文學創作應表現哪些內容？什麼是好的文學？等問題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本書將從文學的目的、文學創作的要素、文學批評三個層面展開，探討這些問題，從而揭示「詩史」觀在吳偉業文學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七、「梅村體」與明清之際的「詩史」觀。在明清之際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並非只有吳偉業一人具有「詩史」觀，如顧炎武、錢謙

益、黃宗羲、杜濬等一大批文人都會寫過史詩，通過橫向比較，分析為何只有「梅村體」能夠自成體派、影響深遠。

以上七個方面都是圍繞本書的核心論題展開的，本書的核心論題就是：「梅村體」的形成、發展、演變及其對明清之際「詩史」觀的貢獻。

三、「梅村體」辨析

關於「梅村體」的界說，一直以來都存在諸多分歧，或著眼於詩歌的體式特徵，或兼顧詩歌的題材特徵與敘事藝術。故論及「梅村體」，人們往往都會強調「七言歌行」（七古）、「反映明清之際時事」、「敘事」等特徵。如此以來，在吳偉業一千一百餘首詩歌當中，同時具備這些特徵的尚不足百首，不到總數的十分之一，而大量獨具一格的作品便都被排除在「梅村體」之外。事實上，一種詩歌體派的獨特風貌固然與諸如體式、創作手法等外在特徵有關，但其形成的真正根源卻在於詩人獨特的詩歌觀念。因此，本書以吳偉業本人的詩學觀念為標準，重新審視「梅村體」。

（一）「梅村體」界說中的分歧

「梅村體」究竟是指吳梅村的哪些詩歌，目前尚存在一些分歧，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種觀點：

其一，著眼於詩歌的體式特徵，以七言歌行為「梅村體」。如清鄭方坤：「七古原本初唐，組織工麗，聲調鏗鏘，世稱『梅村體』」。

〔註 29〕朱則傑先生亦云：「『梅村體』是在繼承唐人歌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所取法的對象主要是初唐四傑和中唐的元稹、白居易。」

〔註 30〕

其二，兼顧詩歌的題材特徵，以具有「詩史」性質的七言歌行為「梅村體」。梅村詩歌的「詩史」性質勿庸置疑，前人對此已普遍

〔註 29〕鄭方坤《國朝名人傳略》卷二，光緒十年三月上海王氏印行。

〔註 30〕朱則傑《清詩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5 頁。